

180704

国际共运史教学参考资料(一)

关于斯大林问题

第四辑

(教学用书·内部参考)

杭州大学马列室斯大林专题组编

一九八三年七月

180704

说 明

斯大林是一位曾经对苏联和当代世界历史、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生过重大影响的历史人物。研究斯大林，全面地、历史地评价斯大林，是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特别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的一项重大课题。

《关于斯大林问题》是个不定期的专刊，旨在向从事斯大林问题的研究者，向从事国际共运史教学工作的同志提供国内外有关斯大林的研究资料，交流斯大林问题的研究情报和成果。

本专刊是内部的研究性的刊物，根据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在译载国外对斯大林研究的资料时，选载不同观点、不同学派的文章和材料，所印文章一般均按原样，期在反映出国际上对斯大林研究的全面情况，我国的研究者当能加以鉴别和取舍。

杭州大学马列主义教研室

斯 大 林 专 题 组

一九八二年十二月



淮阴师院图书馆 730614

目 录

论斯大林和斯大林主义

.....[苏]罗伊·麦德维杰夫(1 —236)

神化了的斯大林与真正的斯大林

.....[苏]阿·阿夫托尔哈诺夫(237—268)

论斯大林和斯大林主义

(苏)罗伊·麦德维杰夫著

序

在一九六二年到一九六八年间，我写了《让历史来审判——斯大林主义的起源及其后果》，并于一九七一年在美国出版。一九七三年春完成的增加了大量材料的修订版于一九七四年用俄语出版^①。然而，自从一九七三年以来，关于斯大林和他那个时代的更多的资料从各种渠道源源不绝地涌到我这里来。虽然近几年来在苏联出版物中已经越来越少地提到斯大林了。但是即使在这里面也可以发现一定数量的关于斯大林的活动的令人感兴趣的情况。同时，当然，最近几年来在西方也出现了一定数量的极为有价值的研究斯大林的著作。尽管这些著作有不少论点是值得商榷的^②。另外，在各种各样的杂志、期刊上还有许多由西方作家和来自苏联的流亡学者写作的大量学术论文和短篇评论文章。

由于在一九七四年出版的《让历史来审判》一书已有一千多页，我认为与其再进行一次修订倒不如写一本全新的书更好些。这样做将使我不仅有机会把新的资料写进去，而且还可以讨论在以前写的那本书中没有提出过或仅仅轻轻一笔带过的问题。

注 释

① 《让历史来审判》(纽约1974年俄文版)。我对出版人艾尔·弗雷德·A·克诺普公司表示深切谢意，因为他们出版了这个俄文增订本。

- ② 例如，罗勃特·C·特克尔主编的《作为革命家的斯大林，1879—1929年》（纽约1973年版）；斯坦芬·F·科恩：《布哈林与布尔什维克革命》（纽约1973年版），

在俄国流亡者著作家的作品中，首先可以提到的当然是索尔仁尼金的三卷本《古拉格群岛》，这是一部异常重要但矛盾百出的书。在西德和意大利还出版了一些纪念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二十周年的文集。主要内容是：作为一种政治现象的斯大林主义，另外还有一些有关苏联历史和苏共党史方面的著作也对斯大林和斯大林主义问题提出了新的见解。

例如，G·波法的《苏联历史，1917—1941年》，（米兰1976年意大利文版）。还应提到的是新近重印出版的四卷本俄文版《反对派公告》（纽约1973年版），这是托洛茨基的东西，最初出版于1929—1941年，可是直到今天苏联的历史学家还是完全看不到的。

英译者的话

自从罗伊·麦德维杰夫完成了《让历史来审判》这部在苏联国内写作的第一本研究斯大林时代的重要著作以来，已经十多年过去了。《论斯大林和斯大林主义》既是对这个研究的重要补充又是一本具有独立价值的书。麦德维杰夫在写作本书时是假定读者对重大事件基本上是熟悉的：在前面带绪言性的几章中谈到了斯大林的性格和他的前期革命活动后，他立即把读者引入了一九一七年的大动乱之中。他这样做是十分适当的，因为麦德维杰夫想要突出某些问题，补充某些新的细节，纠正那些在他看来是被歪曲了的事实或判断上的错误。

《论斯大林和斯大林主义》的独特优点是麦德维杰夫可以在只有一个苏联作家才能得到的资料中搜集情况。同时，他虽然住在苏联但却设法获得了大量西方出版物的有关论述斯大林的文献资料。如果说他经常地对西方学者或苏联流亡学者提出的看法仅仅作一些吹毛求疵的评论，那末他对他手头的材料的编排也就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了。在这方面他的著作——第一次在这里出版，只有少量删节——是最近几年来，来自苏联的很值得重视的文献之一。

《让历史来审判》在苏联出现并秘密流传之后，到麦德维杰夫在莫斯科的寓所去拜访他的人川流不息。那些幸存者一心想去对他讲讲他们自己亲身的经历。详尽地引用这些证言的结果使得对斯大林的性格和行为的评价显得鲜明真实了。

一位想为社会主义下一个更易为人们所接受更加有人情味的定义的苏联作者想在苏联历史上找一个堪与斯大林相匹敌的人是很自然的。从这个角度出发，任何一个要想这样做

的人都会对托洛茨基发生兴趣。但直到最近甚至即使要保住经典著作的原来的定义也已经在事实上成为不可能的了。无论如何由于西方出版的翻印作品(中译注:指《让历史来审判》一书)正在莫斯科找到销路,情况已不允许再那样做了。因而随着书中情节的发展也可能有人会把这本书叫做《托洛茨基与斯大林》。人们很容易想象麦德维杰夫在第一次谈及《反对派的公告》时的情绪,但读者将找不到这样一种明显的态度:即仅仅因为斯大林的错误是如此的明显,而认为托洛茨基是对的。他对托洛茨基的才能以及他的失败的评价是冷静的,公正的,对在他以后的苏联历史的许多评论也都根据实际经验予以检讨。

想对自己祖国的历史的最困难时期之一作出正确的叙述的诚挚愿望总是值得称道的,特别是在一种基本事实已被各式各样的骗人喧嚣所歪曲的情况下更为难能可贵。麦德维杰夫还举出了在苏联著作中出现的一些稀奇古怪的事例。

这里是麦德维杰夫在过去十年中关于这个主题的经过深思熟虑的意见的概括。本书出版的那一年是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周年,因为那是斯大林生日的一百周年。因而这本书也可看作是一种生日的礼物,虽然麦德维杰夫希望的只是在苏联的一次小规模의公开庆祝活动。

在翻译这本书的时候我从若尔思·麦德维杰夫(作者的孪生兄弟一中译注)那里得到了指教和帮助。遇到问题没有比请教作者本人或他所亲近的人更好的办法了。我特别感谢L·夏皮洛和R·F·彼得,他们校阅了译文并提出了许多有益的建议。我还感谢E·格利高力为我细心地打印了译稿。

英译者 E·de·K。

艾伦·德·卡特于伦敦

第一章 早年生活

——一九〇〇年——一九一七年

美国历史学家罗勃特·特克尔在《作为革命家的斯大林》一书中对斯大林的童年和青少年时代进一步作了广泛的叙述。在他的笔下斯大林是一种学说的最好的例证，这种学说认为：一个人的许多——或者说基本的品质、特性是在早年形成的。因为青年斯大林已清楚地显示出了使他日后成为一个暴君的那些性格特点。即使他还是个孩子的时候他就顽强、好胜和决心追求名誉。他十分看不起他的挨别人打的同学，但他自己也十分害怕挨别人打。他的父亲经常打他，他也就变得和父亲一样，脾气暴躁、报复性很强。从童年时代起他就喜爱看书。在青年时代他对格鲁吉亚的浪漫主义作家阿列克山德尔·凯兹贝格的小说《忤逆的人》的印象特别深。这部小说是环绕着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夏密尔反对专制独裁的斗争故事展开的。但这部小说的真正英雄是柯巴、一位无畏的不屈不挠的战士。他把自己理想中的形象赋于了年轻的朱加什维里。他开始把自己叫做柯巴，并硬要他的朋友也这样叫他^①。

斯大林的学生时期对他的发展的巨大影响现在已经没有什么可以怀疑的了。他在戈里上了五年教会学校，接着在梯夫里斯神学院学了三年。在神学院过的是被蒙昧主义，伪善

和互相指责所支配的生活。在这样的气氛中学生们学到的是狡诈、耍手腕以及教条和偏见。从那以后的年月所发生的许多事件中可以看出斯大林一直没有忘却在梯夫里斯神学院度过的那些日子。

在一九四一年至四六年碰巧我在特勃立歇^②，在那里的一所学校教书，年轻人经常谈到斯大林，他们所讲的故事是一种真实和虚构的混合物。例如，据说在一九三六年至一九三八年大清洗时期斯大林亲自下令禁止逮捕他在神学院的老师们。其中一些人迄今仍然健在。另一个插曲被认为是发生在战争即将结束或战争刚结束之后。那时斯大林对正教教会的态度起了急剧的变化。他把格鲁吉亚正教会的教长（十九世纪九十年代他曾是梯夫里斯神学院的一个学生）邀请到莫斯科去作客。当他们谈到过去时，斯大林突然问道：“你们最害怕谁？上帝？还是我？”这位教长被弄得很尴尬，不知怎么回答才好。“你为什么沉默不语？”斯大林讥讽地笑了起来说：“我知道你们更怕我，否则你们就不会穿了普通的世俗的衣服来见我了。”

斯大林的女儿斯维特拉娜·阿列卢耶娃（她信奉正教，在她逃离苏联之前改信基督教。）也肯定了神学院的教育对她父亲的性格的形成所起的重要作用。在《仅仅一年》一书中斯大林的心理状态被描绘得比她在《致友人的二十封信》中更加确切。她写道“教会学校的教育是我父亲所受到的唯一的有系统的教育。在教会学校的十多年时间对确立我父亲在尔后一生中的性格、气质使他内在的特性更加强烈鲜明起了巨大的作用。”

“我父亲对宗教没有任何感情，对一个连一分钟也没有相信过精灵上帝的年轻人来说，无休止的祈祷和强加的宗教

训练只能得到相反的结果，那就是绝对地怀疑“天堂的”至上的一切。结果是十足的唯物主义，玩世不恭，和一种清醒的尘世的现实主义和讲实惠的低调的人生观。他从在神学院的经验得出结论认为：人是充满偏见的和卑鄙的，为了要别人服从就对他们进行欺骗。他们要阴谋、撒谎，作为一种规律干了不少坏事不干好事。”^③

这些观察所见当然是十分真实的，但我仍然不想停留在这些随手可以得到的关于斯大林早年生活的很有限的情况。我将从发生于一九〇〇年的一次事件开始。斯大林被从神学院开除出来不久就被介绍给一位职业革命家维克多·科那托夫斯基，他刚从东西伯利亚（在那里他会见了列宁）流放地归来到达梯夫里斯。在科那托夫斯基的影响下以及阅读《火星报》（1900年开始出版1901年起开始在外高加索流传）年轻的斯大林逐渐地由仰慕列宁而成为他的一个热诚的信徒。

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期托洛茨基曾含蓄地指出斯大林在一九〇〇年到一九一〇年这一时期中什么也没有写。从自己创见的意义上说那是个彻头彻尾的空白时期。这一点在事实上并不如此，虽然托洛茨基在写作时不可能有别的了解方法。很显然斯大林在投身革命的第一年中他对实际活动要比对理论问题要关心得多。就是在那个时候斯大林至少在外高加索就起到了一个理论家的作用。在一九〇一年到一九一七年间他写下了不少小册子和文章，虽然其中大部分只用格鲁吉亚文刊登在由格鲁吉亚社会民主党人主办的不出名的小报上，他也写了相当长的哲学论文题为《无政府主义还是社会主义？》（一九〇六——〇七年）。这一时期的著作编入了他的选集的前两卷中，在一九四五年至一九四六年当这些选

集准备付印时，其中大部分都是第一次被译成俄文的^④。所有这些以后成为无数的、假科学的“研究”和论文的主题的著作确切地说并不是高水平的。斯大林在本世纪初在文字方面的造诣很难从数量或者质量的意义上来和列宁作比较，但也决不能说他在这些年中完全没有什么著作。

因此更令人惊异的是在一九一三年至一九一六年间斯大林竟一点东西也没有写。收在选集第二卷中的最后一篇的写作日期是一九一三年一月至二月，而收在选集第三卷的第一篇的写作日期竟是一九一七年三月。在一九一三年至一九一六年斯大林是在最遥远的流放地中部西伯利亚北方的土鲁克汗斯克。但他并没有被完全地和政治运动隔开来。在一九一五年夏他出席了中央委员会俄罗斯局和布尔什维克杜马议员团的联席会议，在一九一六年他和另外几个布尔什维克写了一封信给《保险问题》杂志。在官方的斯大林传记中提到了据说是后来遗失了的一些致列宁的信件。但基本上他过着孤独的生活，很少和他的流放同伴们接触，也没有什么迹象可以表明他在理论上曾经作过努力。这一点他和大多数布尔什维克不同，他们传统地利用在监狱或流放地的时间作为学习、讨论和推敲理论问题的机会，因此托洛茨基在一九三〇年这样写和事实真相并无多大出入：

“四年的流放期应当是一个不屈不挠地学习、研究理论的阶段。别人在这种境遇中写日记、论文，起草讲稿，从事多方面的通讯联系等等。可以肯定在流放的四年历程中斯大林对一些重大问题如战争，共产国际和革命等不可能一点也没有写。但是我们却徒劳地企图找到他在这四年中这类著作的一鳞半爪。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事实很清楚，哪怕只找到一行字不管主题是什么，这一行也早就会被译成各种文字

出版了，而且还会用名目繁多的大专院校的学者们的评论加以装璜。但这样的一行文字并没有突然出现。那是不是意味着斯大林一点也没有写？很难说。这样是不能令人信服的。但也确实表明他在这四年中一点也没有，绝对没有什么可以拿来作为提高他的声望的东西写出来。”⑥

法国历史学家耶恩——雅各斯·玛丽是这样描述斯大林在一九〇三年至一九〇七年的革命事件中所起的作用的：

“革命的爆发对柯巴（即斯大林）没有多大影响，他在当时只不过是一个省的活动分子而已。这和在这个帝国的另一端的托洛茨基不同，他并没有被革命“发现”。这次革命对他来说似乎是一个幻影从他身边溜过去了。斯大林一直是某委员会的一个成员——最多不过是一级党组织的一个小组成员。柯巴并不具备领导群众运动的必要素质：雄辩、才思敏捷、深谋远虑、满腔热忱，而在动乱到达沸腾状态，当群众一旦能挣脱生活的枷锁而起来创造历史时，这个冷静的不动声色的斯大林就会不知所措。他的才能只表现在幕后活动方面。在一九〇五年当那些把革命付诸行动的许多有才能的人正在街上作出决议时，斯大林却呆在一边。柯巴与革命之间是没有冲突的。”⑦

耶恩——雅各斯·玛丽把斯大林说成是一个委员会的成员之一而不是一个群众的领袖，毫无疑问这是正确的。但有趣的是斯大林的后来的辩护人，为了用釉彩来掩饰他这个缺陷竟遇到了多大的困难啊。比如亨利·巴布什曾经是这样说的：

“斯大林不是一个搞大规模的、喧闹的群众集会的人。他从不凭借华而不实的雄辩、歹徒或传教士的诡计来攫取权力。这是值得历史学家们深思的。有朝一日历史学家们终于

要这样来评价这个人的。斯大林并不是通过这个途径和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结合在一起的。……。可以说，列宁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环境的力量，而事实上他更加是一位鼓动家。然而斯大林，通常宁愿通过党，通过组织的力量来行动。”^⑧

但是巴布什的话没有多久就被人们淡忘了，在一九三七年到五三年间的出版物中，无论是专门讲斯大林的还是一般地论述演讲术和类似这类问题，都异口同声地提到斯大林在这方面的非凡的才能。他被说成是一个其演说足以唤起千百万人民和鼓舞他们去取得巨大革命胜利的高超的鼓动家。

斯大林于一九一七年三月和其他被流放的布尔什维克一起回到了彼得堡。党刚从地下状态转为公开活动，各种组织机构还在形成阶段，彼得堡的布尔什维克的领导人是阿历克山大·希列雅普尼可夫。他于一九一五年被选入中央委员会。根据列宁的指示他在彼得堡建立了中央委员会俄罗斯局，领导全俄社会民主党的全部活动。一九二五年六月三十日应苏联——产联的邀请索尔仁尼金在华盛顿演说时宣称：

“在革命初期领导党中央委员会的那些人之中，差不多都是在起义早已开始之后，为了发动共产主义革命而回到俄国来的流亡知识分子，其中只有一个是地道的工人，他一直到他的生命结束为止一直是一个高度熟练的车工。他就是阿历克山大·施略雅普尼可夫。现在还有谁知道他的名字呢？他不久就被捕，显然因为他是共产党领导人中真正代表工人利益的一个。……。由于他坚强不屈被枪决于狱中。今天在这里的人也许从来没有听到过他的名字。但请允许我提醒你们：在革命以前俄罗斯共产党的头头是施略雅普尼可夫而不是列宁。”^⑨

在这点上索尔仁尼金说得完全不确切。在战争年代党的领袖当然是列宁。正是列宁，他发出指示，提出口号，通过各种渠道设法和施略雅普尼可夫保持联系。但施略雅普尼可夫起了主要作用也是事实。特别是在二月革命的头几个星期是这样的。但苏联历史学家们却忽视了他的重要作用^⑩。

施略雅普尼可夫和莫洛托夫(他也是在二月革命时期成为中央委员会俄罗斯局成员之一)，当时作为党的领导人相对地说都还缺少经验，威望也不太高，这就是为什么他们会那么轻易地被斯大林、加米涅夫和繆拉诺夫推到一边。这几个人一回到彼得堡后就在事实上控制了《真理报》和中央委员会。在一个短时期内党的领导开始推行远远地背离列宁在他的信中所提出的政策。《真理报》编辑部拒绝刊登这些信件的大部分。

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施略雅普尼可夫出版了他的四卷本回忆录，书名是《一九一七年》。在第二卷中他叙述了由加米涅夫、斯大林和繆拉诺夫负责编辑的第一份《真理报》的出现：

“当新的经过改组的《真理报》第一次在三月五日出版时，正是护国论者^⑪获得胜利的日子。整个塔夫利达宫^⑫从杜马委员会^⑬的办事员到革命民主的心脏——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一致的看法是稳健的讲道理的布尔什维克已经压倒了极端主义者。在执行委员会中我们受到了满怀恶意的微笑的欢迎……。但当这一期《真理报》到达工厂时，在我们党内和党的同情者中却引起了完全茫然不知所措的情绪。而我们的敌人却很高兴。连珠炮般的问题向彼得堡委员会、中央政治局和《真理报》编辑部倾泻而来。‘这是怎么回事？’，‘为什么我们的报纸在批判起布尔什维克的路线来了而且转向护国论者

这一边去了？’但彼得堡委员会也像整个党组织一样不知不觉地被政变夺了权。党员们受骗了，他们还在责怪中央政治局，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在各级党组织中激起了普遍的不满情绪。当他们发现《真理报》已被从西伯利亚回来的三个以前的编委夺过去以后，他们都要求把他们从党内开除出去。”^⑭

毫无疑问加米涅夫应对这条新的布尔什维克路线的形成负最大责任。但在那个时候斯大林却是完全同意这样做的。从他自己的一些文章中以及他作为《真理报》的编委之一这个事实，斯大林对加米涅夫在报纸上不管写了些什么他都有责任。后来斯大林也部份地承认了这个责任。在斯大林为《通向十月革命的道路》一书（该书是斯大林的秘书伊凡·托夫斯托喀所写。他把斯大林在一九一七年三月——十月间写的全部著作搜集在这本书里）作序时，他写道：

“被沙皇的监狱和流放分散到各地的布尔什维克们，突然地得到一个机会，从俄国的不同边缘地区走到了一起，来共同制订出一个纲领——他们不可能一下子就把握住新的形势。毫无疑问，在探索新的方向时，党在和平问题上和政权归苏维埃方面要在中途停顿一下。列宁的著名的《四月提纲》在使党能够不停顿地走一条新的道路上前进是必要的。我在对中央工会理事会党组讲话时，早已说过，那个时候，在四月中旬，我和党内大多数人一样也站在错误的立场上，完全地拒绝把我自己和这个提纲联结在一起。”^⑮

但是，即使在他承认自己的错误时，在他说“党内大多数人”都抱同一观点时，斯大林仍然是不老实的。当然在彼得格勒的布尔什维克党确曾采取了不同的立场。而且正是斯大林，他在一九一七年三月二十七日至四月二日举行的第一次

合法的全俄布尔什维克党代表会议上，为《真理报》的路线辩护。就在这次会议上，斯大林在一次讲话中甚至还提议为了克服党内的“小小的”意见分歧而与孟什维克统一的可能性。只是由于列宁回到了俄国才最后扭转了党的路线。托洛茨基在他的《俄国革命史》中谈到了斯大林政治生涯中的一段插曲：

“加米涅夫，中央机关报流亡编辑部的一个编委，斯大林，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和缪拉诺夫，杜马议会的一个代表，把立场谈不上左的《真理报》的原编委们撤掉，提出了他们的多少有点可疑的权利，在三月十五日把《真理报》掌握到自己的手里。在新编辑部发表的纲领声明中宣称布尔什维克坚定地支持临时政府，只要它在和反动派、反革命进行斗争。新编委们在战争问题上表明了自己并不比无条件支持差了多少。当德国军队继续服从他们的皇帝时，俄国的士兵们必须‘坚守自己的岗位，以枪对枪、以炮对炮。…我们的口号不是空洞的‘打倒战争！’我们的口号是对临时政府施加压力，目的是强迫它…去设法说服所有的交战国立即举行谈判。在此之前每个人都必须坚守自己的战斗岗位！”这种想法和他们一系列的讲话和文章，是彻头彻尾的护国论者。想用对一个帝国主义政府施加压力的方法使之采取一种和平政策的纲领——这是德国的考茨基，法国的耶恩·龙格和英国的麦克唐纳的纲领，但决不是正在号召推翻帝国主义统治的列宁的纲领……。

《真理报》不久被迫刊登了从维堡区寄来的一封尖锐的抗议书：“如果它(报纸)不想失去工人的信任，它必须表现出革命的意志来而不顾那些貌似聪明的资产阶级蠢货们会感到多么痛心。”这些来自下层的抗议迫使那些编委们在表示自己

意见时格外地小心些。但他们的政策没有改变。即使在列宁的第一封远方来信到达时也没有对他们产生影响。他们已完全全地向右转了。”^⑩

这是很奇怪的，迟至一九二四年至二五年，在斯大林反对托洛茨基的中期，他不但反复地提到《真理报》的错误而且还讲到他自己对它们(《真理报》上的文章)应负的责任说“这种立场是一种极其严重的错误的立场”。他在一次讲话中说：“因为它导致和平幻想，中了护国论者的圈套。在那个时候我和其他党内的同志一样站在这种错误的立场上。”^⑪

但不到一、二年，在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二人和托洛茨基一起组成了联合的反对派以后，斯大林和他的那一派人就说首先是加米涅夫应对一九一七年三月中所犯的 错误 负责。而在讲到这件事的尔后的再版中加米涅夫就要对那段插曲负完全的责任了。因而爱密连·雅鲁斯拉夫斯基在他的《布尔什维克党的历史》一书中，曾经谨慎地提到过斯大林的错误，但在该书的以后的几版中就这样写了：

……不用说，加米涅夫的文章受到了如果不是绝大多数的党员就是受到了一个有影响的党员的敌意的对待。作为一个一般的规律，这样的一种护国论者或半护国论者的思想感情是十分罕见的。加米涅夫表现了这一类动摇决不是偶然的，是他的右倾机会主义立场的逻辑发展的必然结果。他在战争年代中采取了这种立场并设法加以发展，直到列宁到达的那个时刻他才来了一个突然的完全的向后转。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和斯大林起主要领导作用的《真理报》，作为中央委员会的机关级与加米涅夫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进行了斗争。他企图把这条路线强加到《真理报》的文章中去。……。”^⑫

但甚至在斯大林亲自编写的党史《简明教程》中也出现了